

# 云冈梵境

冯楫



云冈第20窟露天大佛

云冈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它是东方石雕艺术的瑰宝，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亦代表着公元5—6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2001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名闻遐迩，享誉中外。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云冈石窟山顶还隐藏着一座明代古堡，山下原来也有一座古堡。

建在山上的古堡不为稀奇，可在石窟之上的古堡却独此一家；古堡的形制各有千秋，可山上山下连在一起的古堡也是独此一份。

云冈堡分上堡和下堡。建在山上的上堡是后建的，建在山下的下堡却是先建的。

有明一代，蒙古部族是明廷的心腹大患，蒙古铁骑不时冲破边关，侵扰中原。为了防御蒙古，明廷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战区。其中，大同镇作为拱卫京师西大门，直面强大的蒙古部族，军事地位非常重要，防御体系完备，号称九边第一镇。除了设立九边重镇，明廷还不断修边、建堡、筑

台，仅在大同镇就先修筑边墙516里，内五堡、外五堡、塞外五堡，云冈六堡等主要城堡共计72座，其中城20座，堡52座，边墩776，烽燧833个。尤其嘉靖时期，蒙古部族俺达汗兴起，驻牧于宣大边外，因其所处之地贫瘠，“以故最喜为寇抄”。而此时，大同镇大边、二边俱失守，镇城“孤悬极边”，与胡人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完全暴露于外。为了加强防御力量，整个嘉靖朝，明廷在大同镇修建军堡49个，云冈堡即在其中。云冈堡的修筑与桃松寨事件有关。

桃松寨是蒙古俺答之子辛爱黄台吉的第三妾，她与辛爱部下收令哥私通，被辛爱发觉，桃松寨怕被问罪杀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间与收令哥出逃，前来明朝大同镇新平堡投降，守城人接纳了他们，宣大总督杨顺把他们送到京城，请功邀赏。辛爱在俺达几个儿子中，实力最强且凶残狡诈，得知桃松寨投降明廷后，异常愤怒，向明朝要人，被拒绝，遂纵骑掠夺塞内，大同左、右、威远、平鲁四卫诸墩堡尽为攻毁，尤其右卫城被重重包围长达八个月之久。右卫危在旦夕，大同岌岌可危。明廷加派更勇文武大臣，令兵部侍郎江东急去宣大督行总督事，与巡抚杨

选、总兵张承勋带领主客兵数万人，进军大同右卫。接着，兵部尚书杨博调集各镇兵马，筹备粮饷，统率大军随后增援。蒙古部众久围右卫不下，听到明朝大军即将到来的消息，随即移帐逃走，解除了对右卫城的包围。

右卫之围解除后，边患仍在，当时，“墩堡悉毁于虏，遗一孤城于极塞外”，大同镇城形势堪危。为了加强边防，防止蒙古部族再次进攻，总督宣大尚书杨博上书：“大同中、东、西三路，俱当添设墩堡，而西路尤急，请发兵部银三万两修牛心山、云阳铺各旧堡，而别筑新堡于红土铺、黄土坡二处，仍于各堡空内，每四里修墩一座，分军戍之。”所修之堡分别为云冈堡、云西堡、云阳堡、牛心堡、黄土堡、红土堡，号称“云冈六堡”。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五月，六堡全部竣工，用时大约一年。该六堡处于镇城、高山、左卫、右卫之间，扼守由塞外通往大同的交通要道。

云冈堡实际上是在一座叫做“石佛寺”的废弃旧堡基础上修筑的。当时旧堡已经“累年风雨摧坏”，新筑工程是依照原样进行的重建。云冈堡重修工程始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八月之前，整个工程历时7年。从那时起，才有了“云冈堡”之称，云冈石窟也因此定名。在此之前，这里庞大的石窟群及寺院或称“武州山石窟寺”“灵岩寺石窟”，或笼统地叫“大佛寺”“石佛寺”等等，罕有今日人们熟知的“云冈石窟”之名。云冈堡建成之后“设操守一员，把总二员，坐堡一员，募募官五百名”。这个云冈堡即下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郑振铎、冰心等文化人士参观云冈石窟。冰心《游云冈》载，“自山下云冈堡绕回，进怀远、迎曦二门，门上额书为明万历十四年

(1586年)所立。堡内道旁尽是民居土屋，并有‘留人小店’。街中朝南有庙名碧霞宫，对面向戏台一座，也是明代建筑……”从中可见当时下堡保存尚好。而今，云冈下堡残存堡墙仅49米，原有建筑形制已不知晓。原西门“怀远”石碑存于云冈第7窟内，东门“迎曦”石碑早已不知去向。

已然有了云冈下堡，而且已经重修，为什么还要建云冈上堡呢？

云冈堡位于大同通往左卫(现左云)的交通要道，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因“旧城地形卑下，北面受敌”，虽已修筑下堡，但于事无补，故万历二年(1574年)即于崖北创筑一新堡，即云冈上堡，并移官军于此，改变了旧堡地形低下，容易受敌的劣势。

新堡“女墙砖砌，通高三丈五尺，周一里四分零，设操守官一员，所领见在旗军二百一十八名，马一十二匹，火路墩八座。”云冈堡不仅位于大同通往左云的交通孔道，而且处于大同煤炭中心。其东为晋华宫煤矿，西面为吴官屯煤矿，周围则遍布中小煤矿。因此，云冈堡的修建不仅控制交通要道，而且也利于保障镇城百姓所用煤炭。

云冈上堡略呈方形，周520米。堡墙高约9米，墙顶宽约4米，除南堡墙的西部坍塌，其余保存相对较好。该堡开南门，门洞墙基处外露石条5层，外有呈半圆的瓮城，开西门。堡门外西南残留有玉皇阁台基，玉皇阁位于第20窟窟顶，其下为著名的露天大佛。上堡土筑，女墙砖砌，“下有寒泉，皆佛窟，亦灵境也。”从空中俯瞰，上堡四面形如“只”字，其中，“口”字部分是堡之主体，“八”字部分则分为东西两道翼墙，向东南、西南方向各有延伸，仿佛两支手臂，将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揽入怀中。



云冈上堡

2021年大同评选“长城八景”，“云冈梵境”赫然入列。“云冈梵境”至少有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云冈石窟是长城边塞的佛教文化圣地，并集长城文化与石窟佛教文化、蔚为壮观。这正是云冈堡的独特之处，也是大同长城八景之“云冈梵境”的主要由来。长城与黄河在老牛湾紧密握手，成为山西长城线上一道标志性的独特景观。在武周山，在云冈，雄伟奇健的北魏造像和厚重沧桑的明长城古堡融为一体，堪称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

第二，云冈堡下的云冈石窟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从东到西绵延1公里，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龕252个，石雕造像59000余躯。万亿化

身，罗列满山，雕刻着数以万计的佛、菩萨、天王、力士、飞天等，堪称一座博大精深、旷世无双的佛国天堂。漫步云冈石窟，自然能感受到佛国梵境无边的静穆、庄严、精深和博大。

第三，整个云冈石窟文化长廊延伸15公里多，辽金时就有“十寺建筑”。当年庙宇一座连着一座，香火十分旺盛。至今还有观音堂、佛宇弯、鹿野苑石窟、青磁窑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和焦山寺石窟等历史遗存分布，形成连绵不绝的佛教文化长廊。

第四，“石窟摩云”是清代大同“云中八景”之一，从一个侧面印证云冈石窟的佛国圣境。游人登上楼阁顶上时，可谓有“山峰楼阁与天齐，佛顶似接白云”之感，故有“石窟摩云”之说。

## 云冈学研究项目进行立项评审



立项评审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 2024年10月15日下午，山西省文物局对云冈学研究项目进行立项评审。此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科技处副处长孙婉婧主持，邀请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汪万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陈家昌担任评审专家。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何建国，科研办主任郭静娜参与了此次评审会。

2025年度云冈研究院共上报云冈学项目7项，其中研究类主要涉及云冈

石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口述史、流散海外的云冈石窟造像、数字化保护传承及活化利用等方面。课题主要从云冈石窟开凿前北魏平城社会制度、佛教艺术、文化风俗、流散海外的云冈造像等方面入手，通过对云冈石窟本体的深入研究，以丰富和完善相关领域的知识体系，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流散海外文物的研究，对于当下文物保护政策的制定、发展旅游业与国内外相关机构进行合作展陈、研究、交流以及国家追索文物有重要意义。

保护类项目主要涉及胶结材料、

纳米钙铝水滑石与防风化保护材料效果研究。项目中涉及的新材料研究应用，提出了目前最适宜云冈石窟应用场景的保护材料，通过构建中长期评价指标，逐步建立长效评价体系。其研究成果将直接应用于云冈石窟保护工作，为我省乃至全国同类石窟保护提供借鉴。通过新材料的研发，石窟寺保护工作将实现更加科学规范的管理，使石窟寺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得到更好的展现与传承。

评审会上，各项目负责人详细介绍了项目的研究背景与目的意义、研

究内容与技术路线、研究基础与工作安排部署、前期调研、初步分析与经费预算。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汇报，对项目组的早期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每一个项目存在的不足之处都做了具体指导。专家组一致认为，这些项目紧紧围绕云冈学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契合云冈学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目标，数据分析和资料准备扎实可靠。建议进一步聚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重点梳理研究脉络，绘制技术路径，形成既有学术性又有实践性的高质量研究项目。

## 初识云冈石窟(下)

李云峰

### 曾经的湮没，盛世的荣光

印象当中，云冈石窟就是北魏王朝的一个标志。通过这匆匆之间挂一漏万的初相识，终于目睹和碰触到北魏以降上千年宗教活动演变的印痕，是一种活化石形态的存在。通过丁明夷《云冈石窟研究五十年》一文，我进一步详尽了解到，云冈石窟自北魏文帝复法后的和平年间(460~466)开始由昙曜开建石窟寺以来，经历了唐、辽、金时代不同程度的延续乃至再度兴盛；但自明代筑堡始称云冈以来，石窟群除部分佛寺有所修葺，佛像得到妆奁外，总体上已经渐趋于荒废境地；清中期至近代，更是到了湮没无闻、淡出世人视线的不堪境地。云冈石窟院史馆展区开始部分，这样记述当时的沧桑状貌：

到二十世纪初，饱经千年沧桑的云冈呈现出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延



云冈石窟全景

绵一公里的石窟群被前代的军寇残垣分隔东西，西部洞窟变为民居、马厩、炊烟漆像，无复庄严；东部洞窟坍塌、颓废，明清崖刻，无复风骚；中部孑然独立的石佛寺，香客寥寥，早已不再是众善趋瞻的清修胜地。

以至于这样重要的国宝所在，需要等到一个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于1902年来重新“发现”。读到这里，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而更让我心痛的是，是随着法国汉学家沙畹摄影家来到云冈，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古迹照片著成《北中国考古图录》于1907年出版，在让云冈石窟声名鹊起的同时，也招来了各色探宝者和为帝国主义列强收罗文物的古玩商，他们诱骗当地农民、流氓，甚至串通军队，猖狂盗凿佛像、佛头……截至1929年9月，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员前往云冈进行调查统计的结果是，共损毁、丢失石佛96尊。据相

关资料显示，这些被盗文物流失海外后，目前主要分散在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

清代中晚期以来，国宝级文物的被窃、损毁与湮没，岂止云冈石窟！罗哲文等编著的《中国名窟——石窟寺摩崖石刻与造像》一书，在介绍龙门石窟宾阳洞内大型浮雕作品的时候，特别说明道：“《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在解放前已被帝国主义分子盗往国外。”此外，其他佛、道教石窟造像被盗被毁的记录，也都留下了侵华强盗的罪恶行迹……那不堪回首的落后挨打、沦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悲惨过往，中华民族的全体国民和子孙后代都应该永远铭记！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应声奋发、强我中华，文化遗产被毁湮没、被劫掠被掠夺的历史才不会重演，后来者也不再会为许多国宝级文物陈列在昔日强盗的国家博物馆里而汗颜，为爱国者高价赎回一件件文物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宝才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丁明夷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北魏的统治者竭财力以趋佛，适国情而竞新，使这座新兴的都会充满了浓郁的神秘色彩。这里的石窟规模和造像模式，在当时及其以后，对中国石窟的兴建与发展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旧时代的过往，或许当一个朝代国力强盛的时候，这样的投资就

是文明建设的需要；如果一个朝代处于落后挨打的不堪境地，再醉心于此，可能就是劳民伤财、麻醉民众、祈求权力稳固的不切实际。但是不管怎样，站在后世的视角，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层面考量，这一切的文化、宗教、精神的融合与创造，都可以视为文化精神层面的长线投资，就像云冈石窟，终于可以以文明成果的形态呈现给今天的人们，丰富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厚重与无与伦比的优秀。

我曾经把贯穿数千年民族发展史与史书有补充验证价值的青铜铭文、石鼓文、碑碣铭文，称作立体的史书。那么面对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内外形神兼备、生动形象的众多神性化的人物和各类动植物及建筑物造像，不正是古代工匠为我们留存下来的北魏时代中华先民礼佛生活情态的影像传达吗？正是它们，与莫高窟、麦积山和永乐宫等诸多寺庙里的壁画一起，以另一种形象生动和精彩绝伦的形式，再现史书与碑刻文字记述内容的影像景致，成为煌煌史册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折射出中华民族曾经波澜壮阔、赓续不辍、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幕文明华章。

而今，在这国富民强、民族复兴的非凡时代，面对游人如织、景色壮美的云冈景区，当真可以感受到文旅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我为自己的国家拥有如此良好的面貌向全世界展示国宝，感到由衷的骄傲！

## 云冈研究院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共话云冈可持续发展



合作对接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 10月16日下午，云冈研究院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召开合作对接会，就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旅游管理研究、人才培养以及院校互访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张骁鸣、院长助理梁增贤，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党委委员、文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以及综合部部长赫福强参加会谈。

会上，张骁鸣结合典型案例介绍了包括合作研发和推出建设管理培训、联合发起面向大学生的系列主题项目、共建中山大学与云冈研究院联合教学研究中心、数字石窟资源共享与平台建设

等在内的多个合作意向，并分别从合作目标、合作模式、推进步骤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杭侃表示，院校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一方面，云冈研究院可以借助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专业知识，进一步提升云冈石窟的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体验。另一方面，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可以通过云冈石窟深入探索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发展路径，为推动我国文旅事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双方要积极交流，资源共享，研发多种形式交流与合作项目，共同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